

13.08 21

连城文史资料

第十四辑

90

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福建省连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

連城文史資料

第十四輯

一九九〇年十月

《连城文史资料》第十四輯

目 录

在谭震林同志身边·····	扬金保口述 (1)
忆先父沈毅民·····	沈持衡 (10)
裱褙师傅黄文卿·····	罗仲南 (16)
建设中的邱家山林场·····	江兴根 (18)
连城东片的一颗绿珠	
新地伐木场·····	黄 榜 (23)
朋口船运兴衰记·····	傅 裕 (28)
隔川喜炮·····	陈长源 (33)
李屋瓷业生产简况·····	范福松 张柏光 (37)
连城县印刷厂简史·····	吴鸿猷 (40)
连城商业见闻散记·····	吴鸿猷 (44)
稀有的珍贵鱼类——福建蕨胸跳·····	黄善辉 (49)
梅花山——神奇的宝山·····	张金汉 张伯发 (52)
秀丽的小金山宝华寺·····	张 平 (59)
黄胜村见闻·····	朱喜钦 (62)
再说屏山·····	邱美铤 (65)

连城地质初探.....	陈百流 (68)
芷溪黄杨邱华诸姓初探.....	黄 森 (76)
张家营张氏溯源.....	张展文 (82)
城关熟语续考.....	谢济中 (85)
连城巫家拳.....	蒋文达 沈显南 (94)
连城县体育大事记.....	罗炳清整理 (100)

在譚震林同志身边

杨金保 口述

我是1932年参加革命的，在革命的大熔炉里，我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。

我参加革命后，就跟随红九团转战于连（连城）、宁（宁洋）、岩（龙岩）、永（永安）一带交界山区。1935年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成立。1936年春，我被组织派往平和县畚寮村白区交通站工作。

交通站的任务主要是传送中央和闽西南军政委员会的文件，把信件送到粤东游击区。这期间，谭震林同志经常到我们交通站检查指导工作，所以常常能见到他。当时，谭震林同志化名黄权。他穿着朴素，平易近人，非常关心我们，经常教导我们要自觉挤时间学文化，他常说：

“干革命没有文化不行，你们既要关心时事、政治，也要刻苦学文化。没有书本学，多抄几首革命民歌也好。”，他常说：“在白区交通站工

作，要保持高度的革命警惕性，千万麻痹不得。每次执行任务前都要认真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，周密研究突发事件的对策。”有一次，我从大埔送信回到交通站，谭震林同志正好下来检查工作。我们向他汇报工作后，第二天，他特地邀我陪他到永定县大溪万石村，白天，深入群众宣传革命道理，宣传红军的性质、宗旨和红军长征的伟大胜利；晚上，我们便到一个单家独户的屋背山上，住在临时搭起的草棚里。一连三四天，他做了许多群众工作，也给我讲了好多革命故事。他的每一席话都启发教育我们要坚信共产党，要坚信革命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。

那年春夏之交的一天，我和廖永根同志奉命送一份密件到永定与平和交界的斗树坪，亲自交给谭震林同志。但当我们送到时，谭已转移。直到次日黄昏，我们才在平和与南靖交界的科岭，找到谭震林同志。这两天，我们足足走了三百余里山路，谭震林同志夸我们炼出了铁脚板，真能走。

1936年底，发生“西安事变”，接着，国共进行谈判。1937年初夏的一天，谭震林同志带我们到永定关山上的小芦溪，跟广东军155师驻下洋镇的部队谈判。我们的任务是保

卫首长的安全。这次谈判大约一个星期，进行了三轮，最后双方达成协议：国民党方面保证停止敌对行动，保存我军建制，保证我军给养，释放政治犯，取消移民并村做法，允许共产党员公开活动。我方同意取消红军番号，接受整编，接受国民党军的统一指挥，共同对日作战。谈判后，部队在小芦溪接受整编。我被编入新四军第二支队第四团第二营侦察排第三班当班长。

部队整编后，进行军事训练，随时准备开赴前线。就在这时，红三团因主要领导犯右倾错误，上了敌人的圈套，导致全团在漳浦城里被国民党157师缴了械。谭震林和王胜同志带领40多人南下漳浦，解决了这一磨擦事件。为了严防敌人不守和谈协议向我发动突然袭击，我们的部队也重新拉上山。以防不测。

接近1938年春节，谭震林同志指示我们侦察排组织一个精干的手枪班，到龙岩新四军办事处报到，准备找新四军领导接受任务。排长吕运平（江西人）点了我和游祥光（上杭人）等十二名战士一同前往。

手枪队组建第二天，我们步行到湖雷，乘坐一辆货车，当天下午赶到龙岩新四军办事处。我们见到谭副司令。他向我们讲明任务后，叫我们好

好休息。

第二天，龙岩办事处为我们包了一部车开往瑞金。谭副司令跟我们一同前往。

到瑞金，我们发现新四军办事处被敌人抄得乱七八糟。当晚，谭副司令率领我们深入群众调查，了解到瑞金办事处是叛徒黄才娣（绰号黄巢狗）带领国民党保安队搞掉的。办事处主任肖忠全同志还被匪徒杀害，其他人员被拘留，从南昌运来的电台等物资被抄走。

次日，谭副司令便率我们到国民党瑞金县政府查问。刚走到县政府门口，叛徒黄才娣带着一连保安人员突然把我们包围起来，气势汹汹地要我们缴械投降。在敌人近身相逼的情况下，谭副司令从容不迫，严辞警告：“我们是新四军新二支队代表，此次奉命到军部接受任务，途经此地，有事要找贵县县长商量。”黄才娣执意不让，后又狂叫：“如果一定要进去，必须把枪枝弹药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不客气！”谭副司令厉声回答：“难道你们还不相信？如果不信，可以陪我们进去叫县太爷打电话问个清楚。眼下国难当头，蒋委员长都已发布命令要国共合作，枪口一致对外，你们还对我们如此无理，到底想干什么？”这时，我们有些同志想跟敌人拼搏。谭

副司令制止说：“不要乱来！他们要枪和子弹，可以交给他们暂时保管。”接着，谭副司令向那些保安人员宣传国内形势，宣传团结抗日的必要性，宣传国共两党团结抗日的有关政策。不少保安人员听了谭副司令的宣传后，手上的枪慢慢往下垂，最后，我们把枪弹交给他们保管，对方派人陪我们进了县府。谭副司令与瑞金县府官员整整交涉两天，才追回南昌送来的电台和汽车，释放办事处和电台工作人员，以及温仰春、张招娣等同志。

事后，我们跟谭副司令步行到赣州城内，住在城里一间旅社。那天正是除夕之日，谭副司令还领我们到一间裁缝店，给每人买了两套中山装。年初一，我们又往南步行，走到大余县池江镇。我们看到了新四军副军长项英。谭副司令跟项副军长商谈了一个星期。项副军长还给我们短枪队员每人发两套灰色军衣，还有帽子、绑腿等。第七天，谭副司令找我们谈话，要我们短枪队员送项英副军长回南昌。出发前，我被任命为新四军司令部特务排排长。我们是乘船北上的。

到了南昌，我们住在新四军司令部。

过了一个多月，我们听说谭副司令他们已乘火车去安徽省屯溪市，军首长叫我们赶到屯溪附近的岩寺镇。当时，我手上的伤口发炎，便到镇

上的军医处治疗。

伤口治好后，我回新四军军部报到，邓子恢同志接待我，找我谈话，叫我到谭震林身边当警卫员，并告诉我：谭震林同志已调第三支队当司令员，住在一个小山村，名叫洋村，身边只有一个警卫员叫黄辅煌。我高兴地接受任务，邓子恢同志还特地派人送我到洋村。

到洋村，谭司令正在教小朋友唱儿童团团歌。我第一次看到他跟孩子们那样亲切，唱得那样快活，那样有表情，心里舍不得上前打扰他。

我在谭司令身边足有一年多时间。谭司令非常关心我们，他总是教导我们要多学习、多看报、多写日记。生活上，他跟我们同甘共苦，他吃什么我们也吃什么，他喜欢吃狗肉，有时还主动邀我买狗杀，一同改善生活。

开始一段，谭司令主要在梅家塘一带宣传抗日救国，动员民众有力出力、有钱出钱支援抗日，组织群众开展游击战争。谭司令工作非常深入，经常到群众家里访贫问苦，宣讲我党抗日主张；找地方上的知名人士、殷实富户座谈，动员他们解囊借款支援抗日。他很善于交结朋友，许多爱国民主人士、殷实富户一经动员就积极行动。有些还主动请谭司令到他家做客。谭司令有

时也不推辞，他对我说：“为了做好团结抗日工作，我们还是要去赴这种宴会的。”

这期间，一批菲律宾爱国华侨的抗日宣传队也编在我们第三支队。每打一仗，谭司令都主动找他们交谈，鼓舞他们的斗志。每次讲话结束，谭司令都总要跟这些爱国华侨同声高唱抗日之歌：“同志们，不要忘了，我们是老百姓的队伍，是老百姓的前哨。火线上，有千百万个弟兄在欢呼，在怒吼。那是自由的信号，是解放的捷报。我们要，要到战地去，去救护，去慰劳，去抬担架，去挖战壕。只有军民合作，才有胜利的明朝……”当时，这支歌对大家鼓舞很大，我至今仍能朗朗上口。

后来，我们到安徽省南陵县浦桥镇。这期间，谭司令经常深入抗战第一线视察、指挥。

有一天下午，谭司令独自外出，我们找了好久，才知道谭司令到浦桥镇对面的白马山游击区警戒线视察。等我找到谭司令，已经夜幕降临。吃过晚饭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们俩才返回司令部。从白马山到司令部约有30华里，要过一个大湖泊，湖里的泥浆深过大腿，我们只好手拉手边摸边走，好不容易才涉过湖泊。在湖岸边，我们

找到一家农户，向他买了一把柴，两人一夜烤火到天亮。在烤火时，谭司令跟我讲了许多话。他讲了抗战的形势，也讲了在闽西打游击时如何吃苦和几次历险的情景，还传授我许多军事常识。天亮后，我们才步行回到司令部。

1939年秋，谭司令叫我到三支队侦察排任排长。一个月左右，调我到教导队学习。学习了一个月后，组织上调我到新四军新编游击队任队长。驻在湾沚戴家村。村对面就是芜湖，有日本鬼子驻扎。那期间，我们游击队几乎每天都跟日本鬼子打仗。

1939年11月中旬，谭司令叫我把游击队带回司令部整编。那时，我右手臂老伤口又发炎，谭司令便安排我去住院。

住院不久，部队开展精兵简政。11月27日，谭司令到医院向我们伤病员作动员，他说：

“党中央指示，为了解决当前部队的给养困难，要开展大生产运动，自力更生，克服困难，还要动员一些能回后方自谋生活的伤病员回后方。我想同志们是能理解党中央这一指示的。你们为革命作出了许多贡献，等到革命胜利时，党和人民是不会忘记你们的……”当时，我们有30多位

同志都响应党中央精兵简政的号召，主动报了名。邓子恢同志还当场给我们每个伤病员颁发了《告别书》、《新四军军人证明书》、《军用差假证》、《残废证》等，财务人员按里程计算，给我发了41块光洋做旅费。

第二天，邓子恢同志给我们买好火车票，亲自送我们到屯溪车站上了火车。

告别首长和战友，我的心情一阵阵难过。列车启动后，我又情不自禁地掏出那张《告别书》，心里默默地念着：“同志们，你们为了革命或伤残，工作不便，为了精兵简政，要回家休养。但是，本军经济困难，你们懂得，没有什么礼物给你们带回去，请原谅。你们将来有困难，一定会有人替你们解决。战争是长期的，随时都有可能重新在一起。你们要把革命的种子带到每个角落去，要把那些懦弱的人们组织起来，把群众团结起来，准备迎接总反攻……”念着、念着，我的眼眶溢出了一串串泪珠……

如今，事隔五十多年。谭震林同志也已经离开人世。我回思往事，历历在目。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、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谭震林同志的光辉形象，仍然不时在我的脑海中浮现出来。令人怀念，令人敬仰！

（林水梅整理）

忆先父沈毅民

沈 持 衡

先父沈毅民（字质刚），生于1891年。1915年冬在日东京受孙中山先生命，返国谋在榕起事，作反袁运动，甫抵榕垣，即为袁逆党李厚基侦捕，于同年十二月卅一日殉难于福州督军署狱中。先父歿时，持衡方七岁。以下所记，皆由先母及亲族相告。

先父十岁时，先祖父即逝世，由先祖母抚养成人。时家住连城西门菖蒲塘。沈姓当时为连城大族之一，仅西门一支，即有男女数百人。由先曾叔祖朗西公任族长。公为清末秀才，人极刚直，得族人敬畏。而吾家自先曾祖及先祖去世后，所遗产业，以及在连城姑田经营之纸业及什货店，皆由公代管。公对先父管教甚严，除代延师在家塾教读外，更自经常督促训诲。直至1906年，先父与先母童氏结婚后，始命其辍学，亲管家业。

先父幼颖悟岐异，在学时所作课文议论，即与当时一般封建意识大不相同，亲管家业及店务也精于勤奋，以此得族长朗西公之赏识，常称其异于亲友中，并以此遗事训幼时之持衡。曾听先母言，公对先父管教以此亦特严，先父虽然婚后，偶有小错，公仍命其长跪受鞭责。先父亦俯首受训，不敢稍有违背。惟其对国家大局之革命意识则极强烈。终致违族长之命，赴日东京求学。在此期间，朗西公曾致书极力劝阻，而先父回信则有“百折不回”之语。公阅信叹曰：“此子休矣”！盖知先父刚直之性，一经决定，则无可挽回，且当时在日国人革命风气浓厚，估计先父必定参与，以其嫉恶如仇性格，必遭小人所忌，终致愤事也。此后先父在狱中临终时，所致朗西公遗书，仍力言其“未参与”革命事，盖恐伤老人之心也。呜呼，亲族间亲情之厚，感人至深。持衡书至此，亦悲痛至几难以下笔矣。

1911年清廷被推翻，成立民国后先父即受时代潮流激发，一面到福州法政学校就学，一面仍照管家乡主要之纸业。在福州成立美成纸行，将姑田所有生产之优良连史纸等，统购统销，改装出口，以扩大东南亚方面之营业范围。不二年，即东渡到日本，进东京明治大学肄业。

即在此时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之中华革命党。

当时闽西长汀所属八县，在日留学者亦多。先父以其待人豪爽素性，不久即以“沈光甫”三字（先父原名君炤，号光甫）闻名于乡人间。当时在东京早稻田大学肄业之傅柏翠先生，亦以此知先父，但二人皆互相闻名，而未见面。即在此时，留日学生受革命思潮影响，多参加中华革命党，进行反袁运动。连城乡人罗毓桐、吴建德以及傅先生等，皆在其列，参加许崇智之领导小组，但先父不在同组。（以上为1911年十月省举行之辛亥革命纪念会中，傅前辈亲告持衡者）。

在1913—1914年间，先父除在日求学外，亦常回国参与家乡事业。在此期间，曾在连城倡办连城县立中学。直至1914年连中成立为止，先父除发起城乡有力人士向县及省政府请求备案及捐献经费外，并出面邀请本县丰图乡知名人士邓光瀛先生出任校长。连中在此后十余年间，曾对当地教育作了大贡献。毕业生从此能到省内外进修，当时进黄埔军校者尤多。持衡亦以此能在1926年县中毕业后出省学习。

1915年间，先父在赴日途中，曾致书上杭傅柏翠先生，约其再东渡共谋国事，当时傅先

生正回家结婚，未果赴。但以先父未晤傅先生之面，而约其共赴国难，可见彼此知心之诚。而傅先生在当年岁末，闻先父在榕殉难时，尚以为先父系在赴日途中受害。（傅前辈语）。

1915年先父赴日后，冬初受革命党之命返国，与莆田林一士会合，谋在榕先去袁逆爪牙伪督军李厚基，然后起事。（1985年省政协《文史资料》第九期《谈李厚基在闽罪恶史》一文中，亦有同样记载）。不幸被奸人告发，先父甫抵闽垣，即为李逆爪牙侦捕，拘禁于督军署监狱中，数经刑讯，坚不吐实，遂于同年岁末与林一士同时殉难。

先父同乡好友罗毓桐先生，在广州军政府时，曾请求当时广东都督胡汉民先生，为先父书一墓志铭，书成后并序文寄回连城我家中，持衡于1931年至沪求学，以及在北京清华大学肄业时，均保存在身。直至1937年，日人寇华，因大部行李留校未携出，以致遗失，其序文已大部忘记，惟记文中序述先父返榕经历中，有“将使独立为他省先”语，可与其谋在榕举事之事实相证实。至其墓志铭，则尚存记忆中，特附于后。

此外，在1927年，根据当时闽报中，刘